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档案文献·乙

抗战时期 国共合作纪实（下）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
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档案文献·乙

抗战时期 国共合作纪实(下)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

红岩革命纪念馆

主 编:孟广涵

副 主 编:周永林 杨奎松 周 勇 牛 军 王明湘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的骨干,皆在于此。”“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总裁为使国人能上承千百代祖宗之遗产,下开亿万年子孙之基业,故对全国青年倍切爱护与重视。青年这一名词,是象征着光明生命。他有健旺的体力,有强烈的意志,有发扬的气概,有纯洁的心情,有热烈的求知欲,此五点都是青年的特征。但行动易流浪漫,意气易趋浮躁,思想易涉空幻,这又是青年常有的弱点。因此,一受到不良社会的打击,每易丧失其本性,变为弱者。青年原要改进社会,转移风气,乃反为社会风气所改移,在国家与个人,俱为重大损失。青年团的组织就是要使青年在总裁直接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施以科学的训练,在行动上予以严格的锻炼,成为刻苦耐劳、任重致远、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人才。我深切愿望我全国青年,都能不负总裁的期许,在青年团的组织下,共同踏上救国的大道,为国家树立百年的基础。

最后,我们应该更加警惕,现在抗战胜利已经在望,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国民革命已经得到初步成功了。总裁说:“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建国的成败,系于全国人民身上,以后国人的责任更益加重了。要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全国人民都应该有自觉,建树正确的人生态度。丹麦哲学家霍夫丁曾说过:“我生在这个世界,对于我的生活,必有一个态度,我的能力就从那方面用。人类有自觉以后,就生这个态度,这个态度的变迁,人类用力的方向亦就变迁。”此言甚是。我希望国人有个新的人生态度,共同用力于革命建国的方向。本书第六章所说的“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对我们人生的态度的正确指示,大家应详细研读。综括起来说:“行知难行易之教”,“求穷理知言之极”,“严自由法治之辨”,这是一般国人都应当遵行的。

(原载《中央周刊》第五卷第三十二期,一九四三年三月)

4. 读《中国之命运》(陶希圣)

我们期待总裁有一部大著指示我们中国革命建国途径。这个期待,现在已经实现了。总裁新著《中国之命运》已经发行了。

我们期待总裁有一部大著,是很久很久的事情。我们的期待是由于下面的各点。

第一,总裁以一身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存亡。换句话说,今日国家民族的命运,实决定于总裁之手。我们虽经常在总裁殷谆告诫、明确指导之下,生活着、工作着,可是我们心目里总有多少根本问题,不能得到详密的指示。特别是这些根本问题,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根本问题的来源,或由于古旧的传统,或由于百年的演变,或由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积累。我们断不敢望总裁以政务业集之身,而追溯往事,至五年十年二十年以上或竟至百年千年五千年之久,以开导我们。然而我们何尝不在渴望之中?从今日起,我们渴望而得不到的指示竟然出乎意外的得到了。总裁的新著,不啻一部近百年史论,尤不啻一部中国民族史论。这部新著,把中国五千年立国之道,百年来衰落之由,和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奋斗,五年半抗战的牺牲,无不指出其详明确切的意义,所以我们预测每个国民必皆本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励今兹。

第二,中国今后的前途和我们今后的作法,是我们每一个国民,当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在存亡绝续里头,盘旋于心中而不能释的问题。我们虽经常从总裁的演讲和书告里面得到指点,然而全盘的计划和整个的方针,还是不容易寻绎出来,今后我们就有了寻绎的来源了。这个来源,是扼要而鲜明的,集国父《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于十万言中,贯之以总裁的力行哲学,张之以抗战的时代精神,达之于日用寻常之微末,出之以宽猛相济之气度,兼继往开来之伟大,与耳提面命之亲切,而摆在每一读者的面前,指示其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预测每个国民必皆以此书为今后努力的南针。

第三,在各种根本问题之中,思想问题,在今日可以说最难解决而最为严重。所以我们期待,总裁的指导亦最为切迫。我们深知总裁的力行哲学。我们曾读总裁的《行的道理》。本此哲学以应用于国计民生各方面,无不得其会通,由此而使我们获得安身立命。救国济世的途径,不为邪说所惑,不为异论所迷,仍不得不进而有所望于总裁更详密更周到的著作。现在这部新著,虽不是哲学的专书,然而其中随处都是宝贵的教训,随处都是精深的哲理。所

以我们又预测每个国民必皆以此书为思想的明灯。

张江陵说：“德与功，本也。言，华也。道德有诸中，于是以宜其蕴蓄，则为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尽也。功绩底于成，于是以述其梗概，则为启从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尽也。惟不得已而发之于言，而言又不足尽其蕴，断其言为也，听之而有味，爱之而心传。”又说：“道德者事之实也，文词者爱之华也，训诂典谟，圣人岂殚精极虑作意而为之者哉？几微内洞，文采外章，扬德考衷，启发幽秘，不求文而自求耳。”这两段语，正是我们对于《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想法。这部书不能尽总裁之德，亦不能尽总裁之功。这部书是总裁不得已而发之于言，而其言又不足以尽其蕴。这部书是不求文而自文的。古人称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总裁文德武功，彪炳千古，抗战建国总裁之功，超越往古；力行哲学与“人类役使科学”，其思想理论，蕴发于《中国之命运》一书，立德立言，蔚然大备。我们要从这许多观点来读此书，国家民族辉煌之前途，益使我兴奋而激励。

（原载《中央周刊》第五卷第三十三期，一九四三年四月）

5. 读《中国之命运》（罗刚）

《中国之命运》可说是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告国民书。由于中国六年来艰苦的抗战，而获得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奠定我们建设国家的基础，使中国历史转入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蒋委员长以民族领袖的地位，抚今追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尤望我全国国民深切认识我中国之命运，担在我全国国民的双肩，而决定于战局发展的今日，绝没有瞻顾徘徊的余地，更不容有盲目倚赖的心理。这是著作本书的主旨。

从“时代”与“建国”两个意义上看，本书是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可以从近百年的历史中看出三个重要阶段；一是鸦片战争；一是国民革命运动；一是抗战建国运动。鸦片战争的结果，开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国父在民族主义中，以“次殖民地”一个

名词来征象它。而“次殖民地”局面的造成,实因近百年军事政治外交等等的失败,而构成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所致。国民革命运动就是反抗这个变局而发生。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用自力更生的力量,解除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打破这个“次殖民地”的地位,将中国造成一个自由平等国家的新局面。三民主义就是这个运动的实典。因为中国的自力更生,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陆政策,遭受严重的打击,遂发动对中国的积极侵略,而中国历史亦因之转入抗战建国的时代。抗战建国运动在性质上看,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就时代的意义上看是中国近代史一个新时期新阶段。《中国之命运》一书,实在是代表这个新时期的伟大著作。这是本书的时代意义。

二

在我们抗战建国现阶段的工作中,最伟大的成就,当然首推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这个伟大的成就不仅使我们国家从近百年来的“次殖民地”局面中解放出来,同时奠定了建设新国家的基础。但是有了这个基础,尚待我们去努力建设。在现代国际上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必有其自立之道。自由平等是赋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质。仅有消极性的自由平等,仍不是真实的自由平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消极的解放,积极性的自由平等,尚有待于建设。我们必须做到有不惧外力侵略的强固国防,有坚强不屈万众一心的国民心理,有不依赖外来接济的自给经济,有科学昌明思想发达的学术文化,才能使我们国家真正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本书指示我们过去革命工作之艰难缔造,以及在革命过程中所遭遇的障碍,并指示我们每一个国民今后努力的方向。换言之,我们能够照书中所指示的去做,才能建设新国家,才能使我们国家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否则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因此,本书所指示的一切,不外是“建国”的方法。在理论上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是一贯的,在实践上特重于五大建设的实施。这是本书与建国的关系。

书中有一个根本要义,为读者所不能忽略的就是在第七章中所示:“宇宙一切新的生命,皆由人来创造,亦要由人来决定。而国家的命运更要由我全国国民本身来创造来决定,自无疑义。一八四二年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的

订立,致我国家民族于衰败与奴辱者,由国民自启之;而今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使我民族获得平等自由者,亦由我国民自得之。”这段话含有最精确的人生哲理。这种“求之在我”的哲理,亦是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中国的古训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又曰:“自求多福。”又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无论个人或一个国家民族,有了这种求之在我的精神,然后才能自重自立自强,始足以图存。根据此义以观将来,我们就不难了解中国之命运,不是操在外人之手,而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之手;不是操在我们子孙之手,而是操在我们这一时代人的手里。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才能了解我们民族领袖谆谆的告诫,和殷殷的期望,是何等的真切。

三

书中以“宗族”替代“民族”含有深切的意义。这在三民主义的理论上是一个新的发展,可以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上得到证明。中华民族在构成的分子上,是融合多数民族而成的,在融合的初期,国内各民族的界限是存在的,但经过相当时期的融化,民族的界限就渐渐消灭,而化为若干宗族了。如春秋时代所谓华夏,仅限于黄河流域各国,长江流域的吴楚,尚是蛮夷之邦。五霸的霸首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即首先伐楚,孔子虽小管仲之器但对管仲佐桓公攘夷的功绩极其赞许。他说:“微管仲吾甚左衽矣。”晋人对于楚人,亦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人,并不将长江流域的人当作同族。但到战国时期,就不相同了。当时的人,对于七国都是等量齐观,一视同仁,黄河流域对于长江流域人的夷夏界限已经根本消灭了。这是由民族化为宗族的一个证明,珠江流域在西汉尚是蛮夷之邦,南越王赵佗报汉文帝书,自称为蛮夷长,到了后来百粤亦融为一族,这又是由民族化为宗族的一个明证。征之近代,满族自入关后,渐与汉族同化,在清朝时代虽然保存汉满的界限,但乱在大部分满人与汉人都融合为一,亦看不出什么明显的民族界限了。根据过去的事实,我们可以断言,如将来国家建设走上轨道,交通发达,教育普及,乱在国内各民族所残留的民族界限,亦将一一消灭而化为宗族,亦是无容疑义的。理论是跟着事实发展的,同时亦是预示事实发展的趋势。当此国家建设正在发展的时候,是需要事实的说明与理论的指示,所以,

蒋委员长在书中以宗族替代民族,不仅表示事实发展的趋势,并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中国领土内的国民,无论在血统上或在生存的利害关系上,都已经打成一片。我们亦何必拘泥于若干形式的不同,而尚保持民族的畛域,授敌人或汉奸以分化与离间的机会呢?

四

本书对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弊害,亦痛切言之,关于自由主义一点,有人深恐此书翻译出国后,易引起西洋人的误会,因为他们所崇奉的是自由的思想。我以为真正能够了解中国的西洋人,一定不会发生误会,就是发生误会,我们也不能够舍己从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国情不同,其所需要的亦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有连理的关系,个人主义在西洋社会所形成的弊害,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从西洋历史上看,法国大革命正是自由主义极盛的时期,罗兰夫人被自由主义送上断头台而大声疾呼说:“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今日中国是新旧转变的时期,正与法国大革命的过渡时代相同。自由主义在一个混乱时期的发展,只有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对于国家前途,弊多利少,五四运动后自由主义对国家的影响如何,在书中已经分析得很详细,我们何能自蹈覆辙。英美各国社会政治一切已经有秩序有组织,原可让自由主义自由发展,他们的国情与中国不同,何能以彼例此。而且我们反对自由主义,并不是盲目的极端的排斥自由主义或个人自由。中国民族性是素来宽大的,中国国民党禀赋民族的精神也是主张宽大的。所以,蒋委员长在书中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由此可见我们对思想的自由,不但不是极端的排斥,而且是相当的承认。自由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求是有限度的自由,所反对的是无限度的自由。在我们的建国的途中,需要统一的信仰与集中的意志,凡是不破坏这两个条件的思想自由,中国国民党是从来主张不干涉的。西洋的革命,因为没有自由而争自由,争得自由以后就觉得宝贵,所以崇尚自由主义,我们历来太自由了,国民如一片散沙,将国家民族的自由亦断送了。所以我们不能再崇尚自由主义。欧美

各国不乏明哲之士,我想对于这个不同之点亦当能了解。

中国共产党问题是现代中国政治上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亦是全国国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国民都愿意知道政府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从这本重要的著作里,可以得到一个明晰的指示。蒋委员长对于过去的历史表示惨痛的回忆,认为宁汉分裂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境外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这在悲痛的回忆中,深致惋惜。至对于今日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局势,亦表示极严正的态度。“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所有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的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扫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妨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革命的障碍?……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同时于严正的态度中,并致恳切的期望。“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仁人,过去各方面无论其有何种歧异的见解,或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无不可以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来消除个人的成见和彼此的芥蒂,……凡是国家每一个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弃;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随便浪费。所以希望大家,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中。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并不是我为了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什么企图或妨碍的意思。”这种坦白严正的精神与诚挚恳切的态度,使每一读者都要受到感动。而且这番话亦可代表大多数国民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不乏爱国之士,自不能无动于衷,应当重新检讨自身的命运而有所更张。否则这个僵局不打破,终非国家之福。

五

总之,本书没有一句话,不是从蒋委员长的心腑里流露出来的。以一个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在其革命的过程中,正不知遭遇到多少磨折,尝受到多少辛酸,现在将他所经历的,所感受的,所希望的,一一诉之国民,更显得语重心长,亲切有味。我们每一个人要将自己置身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去读这本书,去细细体会内中所说的话,才能感觉更真切的意义。

(原载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重庆《中央日报》)

6. 评《中国之命运》(节录)(陈伯达)

四、关于国共关系

蒋介石先生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抹杀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做了极其“忍心害理”的诬蔑。书中这一部分是具有绝大挑拨性的文字,想由此煽动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仇恨。这一重大的历史,关系中国的命运太大了,不可以不表而出之。

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进行改组,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孙中山局处广州一隅,革命旗帜不鲜明,甚至实力不出元帅府一步,军、政、财一切权力都握在假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的军阀手中,而国民党更无一处有健全的革命组织,足以为革命的辅翼。就是在这样时候,在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要求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援助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就挺身而出,援助了孙中山先生,益以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遂使得国民党改组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完全崭新的局面。

首先在革命旗帜方面,在革命政纲方面,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来限于反满,在反满以后,民族主义早已缺乏内容。即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所写的《中国革命之经过》,也如此表现。这是历史事实。全部中山全集可以作为历史的证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没有反

帝,中国革命就将永远不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更将沉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明白揭出反帝革命的旗帜,进行反帝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这是使中国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指标。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在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东西,此种旧民主主义并没有包含彻底地反对封建社会制度,解放广大劳动人民的内容。必须明白揭出反封建的口号,才使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有了新的内容。中国革命民众必由此始能重新获得革命的方向,而动员起来,中国国民党必由此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而和革命民众结合起来,获得革命的新生命。请问:谁首先给中国民众提出了这个明确的革命纲领?谁帮助了孙中山先生把这个革命政纲变成国民党的政纲?请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谁?请问: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即和民众疏隔起来,为民众和青年所冷淡,而改组后情形就大不相同,国民党又开始和民众联系起来,国民党又开始为青年所注意,还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的政纲,有了这反帝反封建的政纲?而国民党之所以有此,除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以及一切真正赞助孙先生这个英明远见的国民党人之外,是不是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应该归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的作者是亲身经过这一段历史的。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几乎一切都被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垄断的吗?那不是既无革命的组织、又无革命的宣传的吗?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都关在党外吗?但改组以后的国民党的组织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党”为止: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变得有生气了,成份改变了,国民党的组织变得真象是革命的组织了,因而促进了大革命的胜利。请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帮助所规划的功劳是谁的功劳?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又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所指挥的军队,有那支算得起来革命的军队?有那支能打得仗的军队?中山先生进行多少年的北伐,

有那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组后，情形不同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学校建立起来了（开始创议组织这个学校的是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俄国顾问，当时《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并不认识这个学校的重要，还不愿当校长呢），由此革命军队也建立起来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很快地打败了陈炯明，又打败了杨希闵、刘震寰，最后得以进行北伐的战争。当时这种革命军队的建立和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几十年没有摸到门径，但一旦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苏联合作，几年之间，便有如此伟大的军事成就。国民党势力之所以得到武汉、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谁之功呢？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蒋先生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织的精神，他绝不像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好吧，就看历史吧，历史是做判断的公正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帮助是那么大，那么起决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所有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完全是分不开的。就说打仗吧：两次东征，几路北伐，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无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牺牲了多少！蒋先生在为黄埔同学录写序言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人所流的血和国民党人的血是分不开的。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究竟用了什么“报德”呢？在统一广东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既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于是就打击到那本来是他所依靠的共产党人身上了。为着达到其打击的目的，就制造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所谓中山舰事件。这事件据作者说是共产党阴谋的，但历史教训是很多的，希特勒焚烧国会，不也说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阴谋吗？当时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以举行这个三月二十日的罪恶的阴谋，第一步就是为的造成藉口，以便把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从黄埔军校中，从国民革命军中的主要工作职位上驱逐出来，并为的实行在国民党内限制共产党人。当时进行这种阴谋的人，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破坏统一战线，正是以为他们诚实可欺而进行的。请问：这就是“道义”吗？这就是不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吗？这就是不“利害自私”

吗？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然而，制造三月二十日事件的阴谋的人，还没有准备就在那时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因为他还没有到达南京，还有利用共产党人之处。现在姑不论当时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业已开始造成许多重大错误，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主张国共合作，拥护北伐的路线，显然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个路线的正确，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参加了北伐的战斗，当时威振中外的各个主要的国民革命军，充当党代表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其大多数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吗？中共党人并在全中国南北各地组织民众，组织便衣队，组织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来响应北伐军，因而造成了中国空前的大革命。大资产阶级代表一方面觉得还有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必要，使得自己可以到达南京，获得全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早已准备了一旦到达南京，获得全国地位的时候，就要实行“清党”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的错误，就是太老实了，没有在发动北伐，发动大革命的时候，同时注意大资产阶级这种反革命的残忍阴谋，而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的罪恶，就是在于实际上帮助了大资产阶级这种反革命阴谋的顺利实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清党”运动的悲惨，在全国历史上找不到前例，即在全世界历史上亦找不到前例；无数忠勇为国的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至国民党内真正忠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与三大政策的人，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流血在大资产阶级刽子手的屠刀下。同胞们！同志们！这就是昨日同盟者的“道义”！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公”与“诚”！这就是不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这就是不“利害自私”，而老实被杀的人倒是“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倒是“利害自私”！呜呼，吾谁欺，欺天乎！

我们许久没有谈起上述这些事了，我们在抗战中，真是相忍为国的。可是蒋介石先生竟然又提起这些事来，并对共产党加上各种忍心害理的诬蔑。真的，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有正义，有血气的中国人，如果不提起这件事便罢，若是提起这件事，就会热血涌上心来。因为这是血债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流了血的呀，这是全国无数革命有为的青年和工农劳苦群众流了血的呀，这是全民族精华的血呀！自“清党”以来，死在国民党刀下的人，真是太

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蒋介石先生说：“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蒋先生发出的问题是可笑的，然而含有重大阴谋在内的：这就是要说共产党是和汉奸汪精卫有勾结。好吧，我们来说历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过程中，不但当汪精卫还革命的时候，有过“汪共同谋”，同时当蒋先生还革命的时候，也有过“蒋共同谋”。当汪精卫还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同谋呢？正如今你蒋先生还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和你同谋呢？至于说到“利用”，那么历史的事实既然那样清楚，谁存心利用人还不明白吗？共产党人无“利用”什么人之必要，而只是认为在对革命有利的条件下，有和一定的人们合作之必要；而另有一种人则确是存心利用共产党人的，对他有利的时候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时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杀，这里包括汪兆铭，也包括蒋介石。

这里倒要问问蒋先生：“九一八”以后，汪兆铭是和蒋先生同谋很久的。汪兆铭在“汪共同谋”的时期，并没有签订卖国协定，也没有跑出去当汉奸，但在汪蒋同谋时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铭当了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卖国政策，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又发表了“睦邻宣言”，因此还和日本交换了大使。抗战后，蒋先生当了国民党总裁，汪兆铭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并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参政会议长……而他竟从重庆逃往南京，当起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来。这一切同谋的内幕，我们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蒋介石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兆铭利用蒋介石呢？还是蒋汪互相利用呢？

关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后来绵延十年的内战，蒋先生认为“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这实在未免太看轻作者自己，而太看重了汉奸汪兆铭了。请研究一下：宁汉是怎样分裂的？岂不是因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清党”么？“四一二”“清党”的“一手造成者”是谁？岂不是你蒋介石先生么？当时汪兆铭到武汉投革命之机，是在宁汉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后，而不是在宁汉分裂

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国主义与南京反动政府共同威胁武汉,汪精卫就由动摇而反动起来,到了那时,汪精卫的清共不就马上赶上了你蒋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吗?

总观作者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为假如没有武汉政府,则共产党早已一网打尽,早就没有什么“共产党问题”了,因此,作者感到怅恨。可是,作者错了,无论在任何场合,共产党是杀不尽的、死不完的,中国共产党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史早已证明过了。

蒋介石先生还罗列了一大篇关于共产党的所谓“罪状”,但那些所谓“罪状”决不能任凭蒋先生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去。多年来所结集的百数十万民族精华的生命,东征北伐的大动力,蒋介石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杀戮,要编造“罪状”,有什么费事?还谈什么“良心”?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要杀戮必须把被杀戮的人的功绩完全改成罪状,这当然也是“残忍阴谋”中应有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忧患,早已看穿了这批自称代表“仁义道德”、“固有德性”的人们是怎样一种刽子手大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仁义道德”呢?男盗女娼呢?如见其肺肝矣!

这是不错的,“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重了!”但刽子手们的悔祸之心何在呢?

十年内战,始祸者是谁呢?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被迫得去为自卫而战,这也不行吗?难道真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难道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要像羔羊一样,不能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反而甘心去受骗,受捕、受刑、受戮吗?让农民得到土地,使得他们可以很好发展自己的生产,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时也就是我们“大逆不赦”的罪名,但这果然是“罪”吗?为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谋福利,我们是有罪吗?“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农村”者是谁呢?请查阅你们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发表的数目字吧,你们每天总发表昨天在那里那里杀“匪”几百几千几万,今天在那里那里杀“匪”几百几千几万,这所谓“匪”者无他,我“和平农村”之和平农民是也。所谓“剿匪军”者,这里烧一城,那里烧一地,大炮也,飞机也,机关枪也,这些外国所供给的东西,都集中起来轰炸

“我国和平农村”，甚至连“我国和平农村”在田里的稻谷，都要设法加以烧毁而后快。这就是“公”！这就是“诚”！这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共产党和民众在一起，艰苦奋斗，领导红军突破“围剿”，终于保存了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精华，锻炼了一支身经百战的民族大军，能够在伟大抗战中抵抗在华敌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持了中国半壁河山。倘使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共产党所锻炼的这支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抵住那样大数目的敌人，能够独立挡住敌人的进攻吗？如果国民党军队不能独立挡住，则敌人不就早已长驱直入重庆、昆明、西安、兰州吗？中国安得有今天？中国安得被列为四强之一？而国民党当局诸公亦安得仍然安安稳稳地坐在重庆？

蒋先生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但是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天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别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共产党人还有一张嘴巴，驳斥这些反革命的诬蔑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心为国，是天下共见的。在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人屡次向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战。但有的国民党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却以为这是共产党“走投无路迫而出此”的结果，可是，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趁火打劫”，而且为着民族团结，不记“清党”之役和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毅然决然主张释放蒋先生。但蒋介石虽被释放了，却还是要设法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怨报德”——总是资产阶级的哲学。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实现，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驰赴疆场，深入敌后，战功卓著，名满全球，但国民党人对之采取了如何的态度呢？不但封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而且仍然在那里大批的捕共产党，杀共产党，骂共产党，打共产党，派遣大批特务钻进共产党中来，企图这样内外夹攻，使

得共产党完全“消灭”。甚至在敌后,国民党人领导的军队不打日寇,而去专打那种打日寇的八路军、新四军,形成与日寇共同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然而这些都不叫做“机巧权术”,都不叫做“残忍阴谋”,都不叫做“利害自私”,而却是叫做“至公”,叫做“至诚”,叫做“不自私”呢!

对于上述这一切,我们也是因为“相忍为国”,许久都不愿见之口舌和笔墨。但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中,既然如此集矢于中国共产党,近日国民党又经过中央社发表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消息,同时准备武力进攻边区,我们对于是非真相,如果再要缄默,则不但对不起无数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而且也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二十二年的历史。

《中国之命运》的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这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法国专制暴君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思想是完全复活了。此章对于全国国民和青年,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和利诱,要他们都一致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对于共产党则充满了杀机。特别其中所说的“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显然是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说的。作者说:“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首先请研究一下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的“宽大”。我们很不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捕共产党,杀共产党,骂共产党,打共产党,派遣大批特务钻进共产党,这些是否就叫做“宽大”?好吧,就说是共产党一万个该杀,但是,共产党以外的许多党派,许多社会集团,许多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一切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一切纯正的青年,甚至一切真正爱国不愿反共的国民党员,他们总算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纠葛了,他们得到过什么“宽大”呢?他们有发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没有?他们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读书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要求民主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要求不当特务的自由没有?那些国民党人例如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等几千几万的人们,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没有?不说政治,来说经济吧,在大后方,农民没有要求减租减息的自由不用提了,